社会调查自白

（1985 年）

按　语

1984 年 7 月 23 日到 8 月 4 日的两个星期里，我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里作了有关社会调查系列讲话。盟中央组织这个讲座的目的，是在贮存和扩散老一辈学者致力一生所得的一些知识，免得失传，有损国家的智力资源。我虽是这个讲座的倡议人之一，但是自问论资论学都够不上格，只是主持其事的钱伟长同志一意坚持要把我列入讲员之列，实在无法推托，勉为其难，滥竽充数，自觉惭愧。我所做到的只是在相当炎热的气温下，总算没有迟到，没有缺课。至于所讲的内容，只是些平时我常讲的有关本人从事社会调查的经过和体会的话。

我在课堂上讲话的习惯是事前大体上打一个腹稿，上场后即兴发挥，缺点是不拘章法，不求面面俱到，长处是不受框框限制，使一些听众受到言外的启迪，激发自动的思考。这系列讲话并非例外。我只把自己过去所做过的社会调查编排个次序，从民族、农村、家庭、小城镇到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各讲一讲。讲我为什么想到做这些调查，怎样调查，又有什么体会。其中并没有多少技术性的指导，也说不上有什么高深的哲理，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自白罢了。

1985 年 1 月 28 日

一、引子

为了在中国智力总库里留下老一辈知识分子学术生涯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为了我们这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长存的社会,民盟中央举办了这次“多学科学术讲座”。来这儿听讲的有全国各地的同志，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我非常高兴，希望能得到好的收获。

我们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正需加速智力开发以缩短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因此，科学地培养人才，合理地使用人才，就成为我国在全球性挑战中能否取胜立足的关键，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一项任务。人才培养，智力开发，要靠我们已有的智力库。在我们现有的智力库里，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已经为数不多了，而且属于他们未来的时间也不多了,这是自然法则,不可抗拒。我在 1980 年时说过一句话“:大概我身边只有十块钱了,一年用一块钱也只能用到八十岁,到那时就做不了什么事了,即使活着也顶不上大用,用起来或许还会害人。”这样说是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一定的年限。这一点是年轻人感觉不到的，青年人往往把自己的生命与无限的时光等同起来，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有时还会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日本电视剧《血疑》用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的时候会怎么样？这里不但有自己怎么办的问题，也有别人怎么对待的问题。这部影片的主题给人以不少启发。

七十至八十岁的这辈老知识分子的时间虽不多了，然而

他们在中国智力结构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们受过严格的、有系统的教育，大都学有专长，各有成就。他们毕生积累的做学问的经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财富。现在他们年事已高,来日不多,再不把宝贵的知识传给后人,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接班人的培养造成无法填补的损失。人死了，他的知识也随着去了，这是很可悲的。要知道，任何知识都不属于哪一个人私有的。它是全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是共同智慧的结晶。个人从社会里得来的知识应当回到社会里去，这就要靠代代相传。后一代要在前一代人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更新发展。这是一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过程，而不是计算机或电脑所能替代得了的。因此在老一辈本身来讲，除了充分发挥余热，继续作出贡献外，还必须主动地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得以延续和发展。

这部分老知识分子大多毕业于抗战之前的高等院校。那时有不少学校有浓厚的学术空气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在学校念书，也都有各自爱好的专业，大多能在博览各种书籍、广泛而又迅速地接触各门知识的基础上专门化。这种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两者相辅相成的知识传递方式，使学生一走出校门就能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因此,尽管此后战乱不断,社会环境险恶，大部分人还是在科学领域作出了成就。可惜的是，全国解放后我们对科学文化学习、传授的规律性东西不予重视。相反,在 1952 年全国大专院校作院系调整以后，理、工科分家,文、理科分家,搞专科分院制。学习各门专业,不强调普通数理化的基础，更谈不到文史的基本知识。攻读文科的不了解当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进入了一个专科就不管其他科目了。学校的规章制度还限制了其他方面学习

的机会和条件。过去清华、北大的课程就不像现在这样限得死死的,那时鼓励学生在学完必修课的基础上跨学科听课,窗台上都有人爬着听课。只要学校承认你是它的学生，听哪门课都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空气自然也就浓厚起来。大家碰头就能谈论交流，念人类学的遇上学语言学的马上就会说到一起去，和学生物的也能讨论一番。

所谓学术，就是人对宇宙实体的认识反映，物质和精神世界本身混然一体，并没有分门别类。当然人在认识它的时候必须有分析，要有先后秩序；人们之间还要有分工，各有偏重，但人为分割的各部分之间是互相联系着的。假如我们把这种分割绝对化，单刀直入，只专一门，在某一个孤立点上做学问，那么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客观世界存在的奥秘，也就不可能有新的学术成就可言。比如学写文章应当学会写杂文。学术研究也应当搞点‘杂文”。“杂”,就是多样化,多种学科的互相交流，互相渗透，融汇贯通，全面发展，这样才能有学习和研究的深度。

当年,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底子就不是现在一般大学生的底子。我学医预科是准备上医学院的。那时医学制度要求两年预科、五年专科。预科就是打底子,包括自然科学的底子,如物理、化学，主要是生物、心理。还学哲学、逻辑、外文、国文，国文里还有版本学。我是在这个基础上转入社会学的。社会学念了三年又转学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知识广阔的学科，从体质到语言、到文化、直到考古。文化、语言、体质都有历史的纵向区分（如猿人、智人与现代人等）和地域的横向区分（如亚、非、欧等洲）。我是在清华研究院学的人类学，我之所以能学体质人类学是

与我有两年医预科的基础分不开的。在清华又补习了解剖学和动物学，由于研究需要还学了数学。

总之，应当是在广泛的学术基础上去搞专门学科的，有了一定的基础才能进入研究阶段。基础与专题研究尤如学与习的关系,基础强调‘学”,研究重于‘习”,学多了才能论及习。学习二字,学字当先。研究一门学问,一要讲基础,二要讲主观能动性。我在研究生期间，老师只给出题，出完了就让我自己去做，平时很少见面，老师只是在晚上散步时来我的研究室检查我的工作。我的资料都摊在桌上，他看了看，没有问题就走了。有问题就给我留个条,上面写着‘重做,错了”,也不说错在哪里。我得重新把一个星期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结果再做一次。为了找出错的原因，我开动脑筋。老师并没有给我一套现成的公式。怎样答题，怎么改错，从来就是我自己的事。久而久之，我懂得了做学问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的道理。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一生中所做的研究都离不开那时的基础。

客观地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比过去复杂得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感到困难。因此，我们更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我们现有的知识微不足道。可是，现在许多大专院校仍然是文、理分科，隔科如隔山。教学方法还是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知识面越来越窄。近年来，我们是引进了不少先进设备，但先进的科学文化又引进了多少？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是过去从苏联搬来的,现在苏联改了,我们还是那一套。看来,我们并不了解别人,也不认识自己。

我们老一代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下一代是国家的未来，我们有责任去引导他们，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我这一辈子做了不少事，应当把我的好经验、好传统传授给下一辈，其中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的就是认识中国社会，为中国社会尽一点力。然而，中国社会如此之大，又有悠久的历史，一个人的一生想要穷尽对它的认识显然是做不到的。可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首先就是认识中国社会，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是脚踏实地做研究，一辈子不停顿，世世代代不间断，积有限认识为无限认识。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探讨客观规律。科学之道在于实事求是，科学结论不能靠主观臆想。诚然，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不免会产生偏见，会或多或少地掺杂一些主观的东西。我们要正视这一点，正视它正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去克服它。不断地克服主观偏见就意味着我们的认识在逐渐深化，使之更接近客观实际。

我想把我自己作为一个标本让你们解剖。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正好是五十个年头,我写的《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可作为你们解剖用的材料之一。我的《学历自述》为大家提供了关于我的学历的梗概，可以说是一幅速写，你们不妨先看一遍，再来认识我这个人。社会学在停顿的三十年间，受到了批判，我从批判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会解剖自己。今天我希望大家也来解剖我，当然今天的解剖不同于过去的‘ 大批判 ”,而是科学地分析一个人的思想过程，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教训。有个美国人把我解剖了一下，写了一本传记，一位日本朋友看了后说“ 他把你写成了一个西方化的学者,而你不是。’看来各人看法不同。我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希望大家在读我的书的时候，看看我的思想有没有中国的特点，这些特点又是怎么表现出来的，以及

找出我在书中所讲的根本东西是什么。有人认为我的书好看，其实那些最好看的地方正是功夫最不到家的地方，因为道理讲不清楚，就要耍耍花腔。花腔的确能吸引人，但那只是才华而不是学问。我的哥哥曾批评我“才胜于学，华多于实。”说的就是功夫不到家。所以我希望青年人千万不要学我的笔法。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无穷变化的世界，学习容不得半点停顿。人们都知道百万年前“北京人”已经知道生火，可是至今还有人不会生炉子，所以，学习是无止境的，到老也学不完。当然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去搞科举，不要为升级或提职去大写文章，要从认识中国社会出发，多了解一些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了解别人才能对自己有所认识。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叫《我看人看我》。我说我喜欢看人看我，因为很多事，自己身在其中，模糊不明。这一点我想大家会有同感。学社会学的人不但要学会认识中国社会，同时也要学会认识自己。过去封建领主的信条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在当代社会，民必须有自知之明。人只有懂得自己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关于这个道理，我不想多花笔墨了，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

既然请你们来解剖我，就得开一个书单。最近两年我的旧著已经重印的有《重访英伦》（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初访美国》和《留英记》两篇在内，都是反映我早年在国外生活时的观感；《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三十年代在大学讲课时写下的对家庭理论的探讨。正在印的《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出版），是我第一次访美后写的。已出版的《访美掠影》是我第二次到美国所看到的情况，由于时间不长，只呆了两个月，所以叫“掠影”。还将重印的是《乡土中国》，这是讲乡土性社会特点的书，是从具体调查

中概括出来的。关于社会学的文章加以汇集起来的小册子有《民族与社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社会学探索》等。第四本叫《论小城镇及其它》还在印刷中。我还喜欢写短篇杂文,已出版的有《杂写甲集》和《杂写乙集》,我还打算继续写短文,大约每年可以出一小册,丙集、丁集这样出下去,不知还能出几集。

开列书单无非是提供解剖对象，解剖手术还是要你们自己动手。这就是说不要企望能从我的这次讲课里得到一套现成的模式和答案。我们一起来作尝试，打破原先的框框，跳出过去习惯的那一套教学方法。因此，在这里我不想从任何结论出发，不讲什么定义，只讲我的一生是怎样从事社会调查的，以及这些调查是怎样影响我的思想的，希望大家在其中找出解剖我的突破口，并有所收益。

二、社会调查概述

有些同志很想通过这次讲座得到关于社会调查的定义，还希望从这儿带走一套现成的社会调查方法，以便回去向领导汇报,并照此办理搞调查。我想提醒有这种想法的同志,那是不现实的。我不想从定义出发讨论问题，也不专门介绍各种具体的调查方法。我要讲的是社会学研究怎么入门，怎么调查，是我个人的体会，给你们作参考，起一个样本的作用。

给一个样本，或者即便是开出一套方法来，都不能把它作为教条去照搬，而只能是从中得到某些启示。要知道任何一种社会调查的经验和方法，都是别人从彼时彼地的具体的社会调查中获得，并加以总结提高的。而接触到的客观事物、

现象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各有其不同的内在联系，有着千变万化的发展过程，有不同的类型。所以，我们不能用某一个模式去硬套，也不能机械地搬用某种方法去分析具有不同特点的研究对象。

硬套和搬用本身，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理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根据我国的特点，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认为这也是社会调查的思想原则和根本出发点。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应当学习它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不是局限于某些具体的结论。这就是说，我们要重视从过去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今后的认识过程；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强调在事物的不断发展中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得出新东西。关于这一点，我想大家一定懂得很多，希望我们都能以此作为这次学习的指导思想。

下面就社会调查的过程，概要谈谈社会调查的一些方法问题以及我的认识和体会。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任何调查都必须经历一个既要符合客观事物、现象的发展路线，又要符合人们主观的认识路线的过程。现在一般把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定题、计划、实施和总结。这四个阶段一环紧扣一环，使我们对要认识的事物从无知到有知。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单一性的，它是从整个人类认识史中抽取出来的小小的一步。事实上，这四个阶段总是在作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后者步着前者的足迹继续走下去，人类的知识不断积累，认识逐渐深化。

我们知道，不管认识过程分为多少阶段，怎么符合事物发展的路线，调查者在各个阶段的实际行动与表现，却不是过程本身所能完全控制的。因此，社会调查能否取得成功，关

键还在于研究者的调查态度。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坚持真理，能否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都离不开有没有一个认真的主观态度。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社会调查不同于物理、化学等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工作者对他们研究对象的态度好坏，丝毫不影响对象的性质及其反映。可社会调查所面对的是与我们同样的活生生的人，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集团的“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立足点在哪里，态度是否诚恳，被调查者要先了解清楚了才能回答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调查他，他先得“调查”你，然后再决定是否让你调查他。这个互相调查的过程很微妙，一旦被调查者发现你的调查态度不那么诚恳，或者你的调查会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损害，他们就不愿意接近你，不肯说出真心话。由此可见，社会调查不仅仅只是一项科学研究，还有群众工作的内容在内。

我常说起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开了几个座谈会，到会的也不过是几个人，他就能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解决了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是因为他靠了两条：第一条是他出身于农村，并有意识地接近农民群众，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这就使他对农村经济状况，农民生活十分熟悉，并有直接的感受。第二条是他十分虚心地通过利益相同的农民去检验、核实自己的想法，使农民体会到他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成了农民的知心朋友。

我看这两条社会调查的经验过去适用，现在仍然适用。中国的社会特点是中国长期的历史造成的，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我们要得到真实客观的资料，就得虚心

诚恳地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做他们的小学生。立足于为人民服务，做群众的知心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才能有诚恳的态度，社会调查的成功才有保证。

社会调查的第一步是定题阶段，即要确定一个调查的主题。初看起来，定题似乎很简单，只要研究者抓出一个题目就行了，但实际做起来不容易。问题是你的研究题目从哪里来？你又如何去作选择？

要使人类由盲目、被动适应社会环境，变为有计划、积极主动进行社会实践，我们就得对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研究和探索。例如，我在下面要作专题讨论的小城镇研究，那是在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课题。当时由于落实了正确的政策，农村的农业、副业和工业都出现了新的起色。可是我们发现农村的 富裕不那么稳 固。如江村农民的养兔副业，就随着海外兔毛市场的涨落而波动，一时间家家户户都养起了长毛兔，没过多久又纷 纷杀兔吃肉。看来在农村地区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中心，农 民的命运就只能操纵在别人手中，这就提出了小城镇建设的问题。由此可见，社会调查的题目，从根本上说是来 自于社会实践 的发展。当然我们也不排斥有些研究课题的提出，是从 对原有理论的质疑开始的。如我对生育制度的探讨，可以说是从“人为什么要生孩子”这一问题引起的。这两种课题往往被区分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如小城镇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应用研究，它对我国的社区、社会变迁等基础理论的建树，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现在社会调查的题目不是少了，而是太多，我们应付不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按轻重缓急作出有秩序的安排，先研究什么，后研究什么，要有所选择，合理安排。对某个

研究者来说，也要循序渐进，逐步扩展研究的题目。选择调查课题的一般原则是既要考虑实际的和理论的意义，即它的迫切性；又要充分估计到它的可行性，要力所能及。在选题上常常容易犯的毛病是脱离实际，想搞大理论，搞一个完整的体系，看不起“小题目”，忽视知识的积累，以至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自己给自己出难题。这样的教训是不少的。

在确定题目以后，要有一个制定研究计划、方案的阶段，这是社会调查的第二步。

计划的制定不能靠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那种像电影里表现的指挥官对着地图想出来的作战方案，在实战中未必行得通，多半要吃败仗。因此，计划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入实际，对具体的研究对象作仔细详尽的观察，从一点或几个点的经验来作计划的依据。这叫做探索性的调查，即先探探路子，为大规模的正式调查作先导。江苏的小城镇研究至今没有全面铺开，我们所做的只是从吴江县开始，在苏南、苏北等地区选点作了观察。在此基础上，现正在设计一套合理可行的指标，打算在今冬明春对全省的小城镇来一个“卷地毯”，即普查性的问卷调查。我们的探索调查搞了 2 年，可见订出研究计划并不容易。

进行探索调查要肯学习、肯钻研、善于思索。除了在对具体的对象作观察时要有这种学习的精神外，我们还要向书本和一切有这方面知识的人请教。我们要尽可能地收集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献资料，对别人已有的研究结论和研究过程作认真的分析，达到借鉴的目的。通过实践、书本两方面的学习、探索，就可以着手制定研究计划了。计划中包含的内容有界定研究范围，拟出调查提纲，明确调查指标以及确定调查的方式等等。这些内容不再一一细述，我只想谈谈调查

的方式问题。

以调查对象的范围宽度为标准，社会调查有三种基本的方式。第一种是普查，普查是对研究范围内的所有对象一个不漏地进行普遍调查的方式，例如人口普查等等。第二种是抽样调查，即从整体中用一定的方法抽取出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对象（这一部分对象就组成该整体的样本）进行调查，并将对样本的调查结果推论到整体。国家统计局的家计调查、企业管理质量调查等，大都采用这种方式。第三种是典型调查，国外所称的“个案研究”大体相似于典型调查。这种方式的研究对象只有一个或还不足以构成样本的少数几个“典型”，研究者通过对典型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达到对事物性质的深入了解。

这三种调查方式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普查所得的资料完整性强，但由于调查量大，项目就不可能很细，全面深入性差；它的结论的可靠程度高，但调查的成本（如人力、物力、费用等）也高，调查的周期长。抽样调查虽然大大缩小了直接进行调查的范围，节省了时间与成本，并在一定的可信度上起到认识总体的作用，但它仍未能解决调查的深入性问题，而且抽样与推论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统计技术。典型调查克服了深入性差的缺陷，通过对典型的全面、详尽的考察，起到深入认识事物性质的作用，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方式。但由于它缺乏范围上的广度，结论就往往具有很强的条件性。普查、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的特点规定了它们各自的适用性。前两者能表现事物整体的数量特征和事物间的数量关系，因而适用于定量的研究。后者能发掘事物的内在特征和内在联系，因而适用于定性的研究。事实上，客观事物总是具有性质与数量两种规定性，所以我们在调查中往往同时采用几种不同

的方式。

社会调查的第三步是收集原始资料的实施阶段。收集资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的方法主要是观察和访问。

观察，是指用我们的感官去注意、反映我们周围的社会现象以及它们发生、发展的过程。认识社会必须观察社会，认真观察社会是取得感性知识的第一步。当然一切有观察能力的人都在观察社会，但科学研究的观察与一般的观察不同，它是一种带有目的的有计划的观察，即为获取原始资料而进行的观察。科学研究不能离开原始资料，而原始资料的可靠程度,就在于我们对事物观察的细致、全面和科学性。前几年，我有一个老朋友搞了一个生物实验。有人怀疑他的原始材料，因为别人在重复这个实验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人说可能显微镜片上有问题。仪器发生了故障，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类似的情况在观察社会时同样存在，因此我们在作间接观察、直接观察或参与观察时就得反复核实原始资料的准确性。

间接观察是指利用别人对那些已经发生过的社会现象的记录，这种原始材料主要是由前人写成的历史资料。历史资料往往由于时代不同、笔者认识的片面性而出现差错。顾颉刚先生在“五四”时期就提出“古史辨”，要重新整理古史。这确实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现在有些研究历史的同志就缺乏这点思考。比如对待历代传下来的史料，我们应该反复查一查，是谁、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写的，有没有搞错，版本对不对，不能太轻易地相信它。对此，我在大学里念过目录学、版本学，很有用处。

直接观察是指对现实的、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所作的观察与记录。照理说这种观察的偏误较少，但我还是要常常对

自己发问‘ 可靠不可靠 ?’我过去在搞人体测量时,往往几次测量的结果都不一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后来才知道是自己没有站稳，两手震动，造成被量的人也摇摆和移动位置，毛病还在于我自己的观察角度不同。由此可见，原始资料的形成由于收集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条件、生活环境条件和操作方法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在观察中应当注意到并尽量避免这种局限性。

“ 参与观察 ’是指研究者参与到要观察的社会团体、社会过程中去作观察的一种方法。我们提倡的联系群众、实行“ 三同 ’等 ,就是这种方法的具体化。采用这种方法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就是你必须做到放得下、进得去、出得来。首先你不能摆出一副学者的派头，要放下架子，使自己处于与被调查者同等的地位。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进入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亲自体验他们的行为意义和喜怒哀乐的情感。但是你毕竟是一个观察者，所以最终你还必须从这种情景中超脱出来，作符合客观的记录与描述。为此，我们不得不提出在进行社会调查之前对调查人员进行系统的训练问题，包括怎样进入角色，怎样观察记录，怎样找出问题等等的方法训练。

访问是收集被调查口述资料的调查方法。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访问总是与观察同时并用的。但是由于西方社会的习俗是不愿意别人闯入他们的生活的，加上近年来现代通讯工具的发达和普及，在西方社会学界便出现了非面对面接触交谈的间接访问方法，如利用电话、调查问卷邮寄等方式的调查。据我看来,这些方法虽在取得某项资料上具有快速、经济的优点，但收获毕竟很有限，也很肤浅。在我国，由于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我们还是应当强调那

种有深度的直接访问，包括个人谈话和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座谈会。

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两者一接触就能谈得来，就能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所以访问的基础是与被调查者搞好关系，使自己成为他们可以信赖的朋友。历次调查经验告诉我们，没有这一层关系要达到一个好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在彼此互不相识，没有一定的关系之前，缺乏信任感，连搭上话都困难，更不要说谈出真实情况了。在菲律宾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洋面上有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对外边去的人都有一定的戒心，他们对突然来的人都要问一问"：那是什么人 ?来干什么 ?"我想任何被调查者都会有这种出于防卫心理的反应,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建立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对于我们取得真实可靠的访问资料是非常重要的。信任是感情交流的基础，有了信任和感情才能相互合作，才能得到真心话，才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性。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凭被调查者口头上说的是真心话就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性。我们在选择别人的答题时要多动脑筋想一想,即从逻辑分析的方法仔细辨别出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 四人帮 ” 横行时期的 “ 外调 ” 根本得不到真话。调查到我，又问我别人的情况，我不愿说真话连累别人，可是不说话就要挨打，怎么办？我只得用另外的方法去骗他们，还要骗得有道理。这种 “ 外调 ” 走到了科学的反面。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用金钱可以去买到情报，因此，情报有的正确，有的则全属虚构。美国还有不少 “ 职业性 ” 的被调查者，他们总是在一个地方接受别人的调查，你要什么他就讲什么。我们现在也有组织参观团到某个地方，常常听到一套

专门为游客介绍的情况，我们可不能根据这些介绍就完全信以为真，随便下一个结论。除了逻辑的辨别方法，在访问中还要注意到各种情景下的不同反应，所谓察言观色是也。如果我们去了解家庭中的婆媳关系，可能会出现媳妇在场时婆婆夸媳妇，媳妇不在场婆婆又骂媳妇；哪是真，哪是假，不能不依据情景作仔细分析。情景还包括调查者本身的加入和访问器具的应用。你带着一个录音机去调查访问某某婆婆和媳妇，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你进门后与媳妇多应酬几句，婆婆很可能不对你说心里话。总之，你的身份，你的行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事物的真实性。对于参加调查人际关系的同志来说，不能不懂得这一点，不能不自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社会调查的最后一步是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和得出结论的总结阶段。在引出调查结论的过程中，我们的分析重点要放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要注意分析社会生活中人们彼此交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掌握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不同的模式，认清各种角色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是怎么表现其固有的特征的。第二，要注意分析社会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现象在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从性质上与数量上找出社会的这一部分或这一现象与其他部分或其他现象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从而达到认识社会整体的目的。

要进行资料的分析就得掌握分析的工具。现在有不少分析的方法，诸如典型分析、统计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系统分析等等。方法虽多，但它们都是围绕着“点与面”、“质与量”、“因与果”这三个关系展开的。